

28/40

鑑真和尚東渡記



100097



2 021 4202 9

鉴真和尚东渡记

孙蔚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

GDA19/03

鉴真和尚东渡记

孙蔚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75 插页 2 字数 64,000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 197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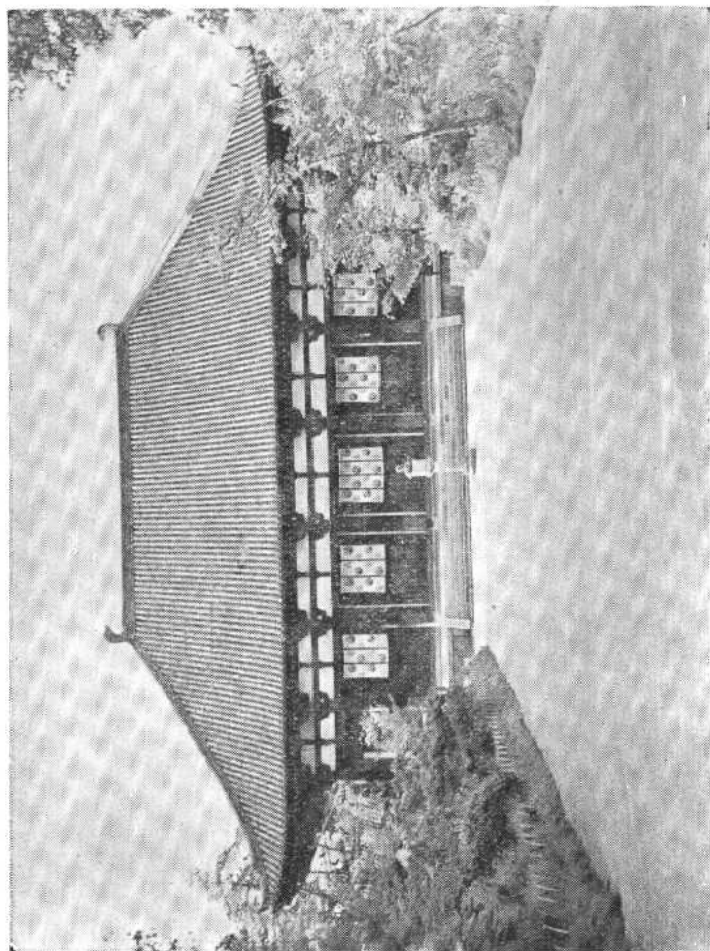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10186·129 定价: 0.3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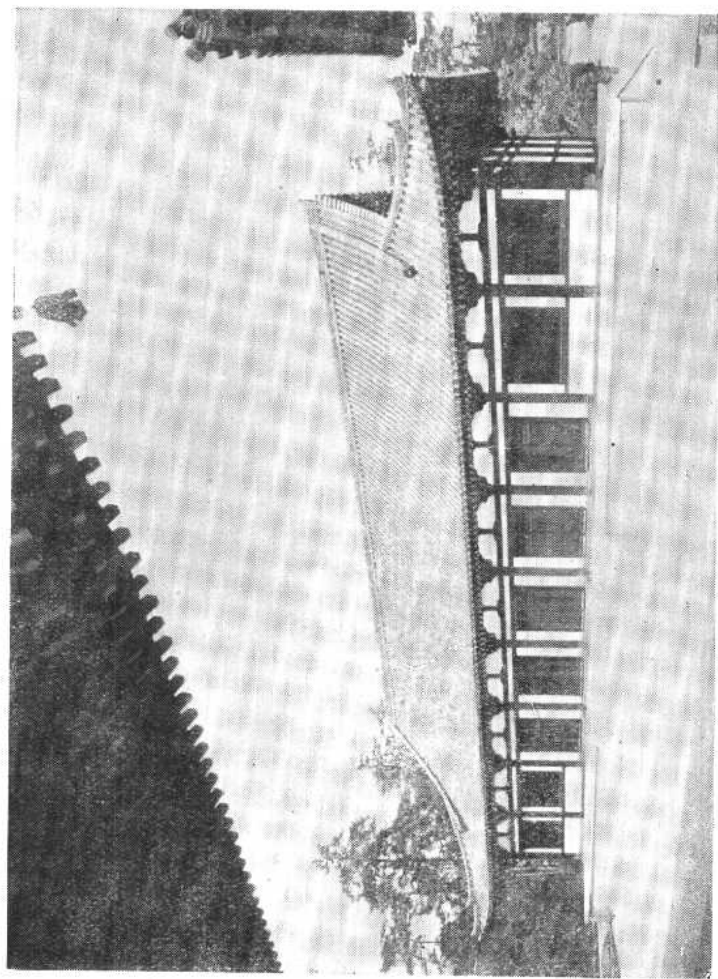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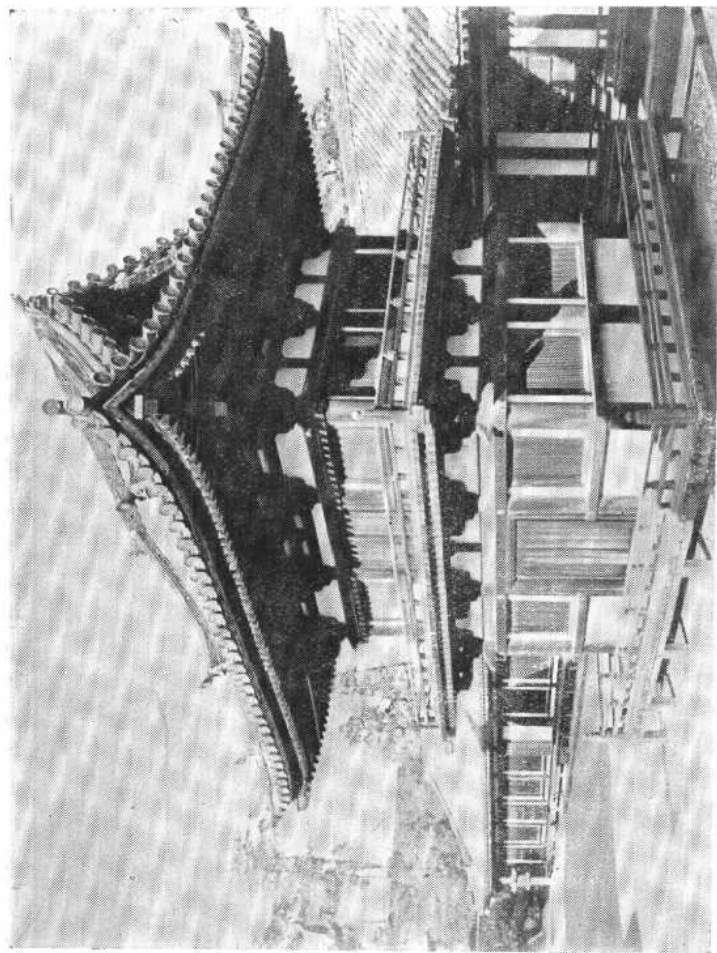
鉴真和尚像(夹纻涂漆彩塑,原高一·八厘米)

日本奈良市唐招提寺金堂



日本奈良市唐招提寺讲堂





日本奈良市唐招提寺舍利殿(鼓楼)

序

《鉴真和尚东渡记》是已故孙蔚民同志的一篇遗稿，现在经过我社编辑整理加工，在孙蔚民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我们给它出版了。

孙蔚民同志(1896—1968)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教育革命家，逝世前是江苏省扬州师范学院院长。一九六三年十月，日本佛教和文化代表团莅临扬州，参加在扬州隆重举行的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典礼，当时孙蔚民同志以文化界代表参加，是接待日本佛教和文化代表团的人员之一。在这前后，孙蔚民同志为了增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他写了《鉴真和尚东渡记》这本小册子和《扬州大明寺考》，都是为纪念鉴真大师而写作的。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极重视中、日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这种友谊，在中、日两国自己的历史长河中无数次的得到了证明，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甕》(这本小说已改编为电影剧本，日本朋友正在进行摄制中)，不但叙述了鉴真大师同他的弟子把佛教戒律流传到日本，而且把我国古代的建筑、雕塑、绘画、书法以及医学、农业、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带去日本，对当时中、日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极大的贡

献。“薨”意味着高瓴,这就是说,日本天平时代和我国唐代天宝年间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高峰。孙蔚民同志的这本小册子,如果能及时出版,正符合了当时我国广大人民要求增强中、日人民友谊的热切希望。

但是,林彪、“四人帮”盗窃了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把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从来制定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等践踏得体无完肤,宗教失掉保护,文化几乎绝灭,自然更谈不上什么对外交流,象一九六三年纪念鉴真大师那样的热闹场面戛然而断了。当然,孙蔚民同志这本遗著也就不可能和读者见面。不仅如此,孙蔚民同志以珍藏文物书画为苏北文化界所熟知,那些珍藏和他搜集的文物资料都被洗劫一空,他本人仅剩下的五分之一的病肺,也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因被迫害而停止了呼吸。侥幸的是,有赖于他的哲嗣们设法藏匿,这本遗稿才得以完整无缺。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此以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副总理为了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访问日本。月底,邓副总理一行到了鉴真大师讲经传戒的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向邓副总理提出了请鉴真大师“回老家探亲”的建议,邓副总理和廖承志副委员长当即表示欢迎。不难想见,这一隆重的仪式如果能在今年实现的话,那时候,我们的“淮左名都”——鉴真大师的老家扬州,又是一番盛况,更非一九六三年的热闹可比。令人惋惜的是,如果孙蔚民同志还在世,他那种迫切的愿望,欢快的心情,又该是怎样的激动

和振奋啊！

鉴真大师应邀东渡时(七四二年)，已届五十五岁高龄，他面临着重山叠嶂，大海茫茫，暗礁怪石，险阻重重，却以大无畏的精神气魄，毅然首途。继而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几经危殆，以致双目失明。但他的决心与勇气毫不动摇，屡仆屡起，终于在第六次航行时有志竟成，达到他传律授戒的宏大志愿。这不能仅仅归功于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有渊博的学问和崇高的品德，誓以毕生的精力来殉他神圣的事业，这种伟大的精神是不朽的，难怪他博得了日本朝野和历代人民的尊敬，不愧为“天平之薨”。孙蔚民同志的著述，体现了这种精神，作为这一史实的具体介绍，必然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从一九六三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六年，在这期间，由于中日友好的不断发展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频繁，日本朋友们对鉴真大师的研究日益深入，成绩卓著；我国学术界和宗教界也正在力起直追，报刊上不断有文章发表，文艺界以鉴真大师为主题的作品正在兴起；这都是孙蔚民同志所不及见的，此书的局限性也在于此，读者们当能予以体谅。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俊民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

前 言

我国唐代(公元618—907年)的佛教界中,有两位杰出的人物,一位是河南偃师人玄奘法师(公元604—664年),一位是扬州江阳人鉴真和尚(公元688—763年)。玄奘法师西行求经,鉴真和尚东渡传法,都不仅对他们所从事的国际佛教事业,更其是对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日本两国人民的友谊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玄奘法师由于译述了大量佛经,他在传布印度文化以及在翻译史上的业绩,为一般知识分子所熟知;而广大人民,则由于小说《西游记》和以西游故事编演的舞台剧以及演唱等等,唐僧取经一事几乎妇孺皆知。但鉴真和尚,则由于他是传布中国文化到日本去,在日本释、俗各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负有盛名;在他的本土——我国,除宗教界和学术界部分知识分子外,则尚未为中国人民所知晓。关于鉴真和尚的文字资料,国内过去除了唐李肇《国史补》中有数十字的简短记述,《全唐诗逸》中辑有高鹤林出使日本时悼念他的一首诗,和宋僧赞宁《高僧传》中的一篇传记以及少数诗歌、笔记偶然提到外,很少留有记载。连扬州、江都等地方志书中,对他的事迹也未曾注意采录。直到解放以后,在我们党的文化政策的指引下,才关切地注意了这一工

作。近年来，由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扩大与增强，人们广泛要求了解两国人民以前的友谊和交往，以及在这一友谊史上起过作用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对鉴真和尚史料的发掘，遗址的探索等工作，都受到了重视。

今年是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从去年起，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就开始联系，准备在两国分别举行纪念活动。日本各界并倡议把1963年5月到1964年5月定为“鉴真年间”，展开各项纪念活动，因此，广大人们对鉴真和尚史实的了解，要求就更为迫切。

这本小册子值此时会，想对鉴真和尚的生平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东渡日本的史实，向读者作一简略的介绍。扬州是鉴真和尚的故乡，但因为过去对乡邦文物探究不多，加以鉴真和尚的史料本来缺少，所以除了从佛教经籍中略事稽钩外，主要还是取资于日本木宫泰彦的《中日交通史》和新近出版的日本学者安藤更生的《鉴真和上传之研究》等作品，而对鉴真和尚一行东渡的经过，则完全依靠日本淡水真人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东征传》是现有文献中距鉴真和尚时间最近、记载最翔实的一篇文献。此文国内流传不多，特附载于末，以供读者参考。

作者识力有限，这本小册子必有不少错误和缺点，敬希读者专家不吝指教。

孙蔚民

1963年5月，扬州

目 次

序 (李俊民)

前 言

一	唐代社会与佛教文化·····	1
二	律学大师鉴真·····	14
三	中日文化交流与遣唐留学僧·····	25
四	鉴真和尚应聘·····	35
五	艰苦的历程·····	44
六	鉴真对日本佛教事业的贡献·····	54
七	鉴真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	68
附:	〔日〕真人元开 《唐大和上东征传》·····	79

插图目次

- 一 鉴真和尚像
- 二 日本奈良市唐招提寺金堂
- 三 日本奈良市唐招提寺讲堂
- 四 日本奈良市唐招提寺舍利殿(鼓楼)

一 唐代社会与佛教文化

鉴真大师是扬州江阳县人。江阳县在今江苏扬州市。扬州自战国末期楚怀王建城起，即名广陵。北齐增置江阳郡，与广陵郡并治。隋初废郡，改为江阳县，与江都并为郡治。唐初一度并入江都，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又重新析置江阳县，至南唐始废。唐代江阳县是扬州(天宝元年扬州改为广陵郡)的附郭，其辖境约当现在扬州市区内汶河路以东，东北至湾头、邵伯各地，东南至江都县张纲镇沿河以西的地域。

扬州地处江淮之间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北邻黄河下游的中原大平原，南接吴、越平原。秦、汉以来，就是东南重地；东晋南渡以后，人口日益稠密，经济日益繁荣。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浚了北起汴梁(今开封市)，南通扬州入长江的通济渠，大业六年接着又开浚了自镇江通杭州的江南河，形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加上沿着运河水道而修筑的蛛网般的驿道，遂使扬州成了东南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黄河以南、沿海一带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是寺院林立，远近僧侣凑集的全中国佛教中心之一。

鉴真和尚生于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据陈垣《释氏疑年录》卷四，鉴真生年考作公元687年。《疑年录》系据宋

赞宁《高僧传》所记“卒于广德六年〔763〕，春秋七十七”逆推，定为垂拱三年。《续日本纪》卷二十四亦作“怡然迁化，时年七十七”。《元亨释书》、《本朝高僧传》俱从之。但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作“春秋七十六”，系据其徒思托所记，应较可靠）。这正是武则天改唐为周的前两年，这段时期，在唐代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不平凡的时期。从政治经济上说，这正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过渡时期，封建经济正处于向上发展的繁荣兴旺的历程；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集团虽然进行着频繁的宫廷政变和派系倾轧，但由于经济上的稳定，整个统治秩序基本上也是稳定的。鉴真和尚出生前两年被镇压下去的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叛乱（事变的漩涡中心正在鉴真的出生地扬州），并未动摇统治秩序，便是这个统治稳定的证明。而且还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女性公开称帝，并较为牢固地统治了十五年之久的独有的历史现象。当然，在武则天改唐为周以前，她从高宗上元（公元674—676年）前后起，已经是实际上的皇朝最高统治者了。

当时唐皇朝对国境四周的征伐已经大体结束，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以来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不仅结束了汉末以来的封建割据和国内各民族互相攻战的混乱局面，而且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安定局面。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上升，终于达到了开元全盛的高峰。关于开元全盛，大诗人杜甫曾于后来在《忆昔》一诗中作过这样的描叙：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

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从杜甫的诗里，就可以看出公元七世纪末叶至公元八世纪前期我国社会繁荣富裕的景象了。在这一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政治基础之上，文化艺术也进入了空前兴盛的时代，不论诗歌、绘画、音乐、戏曲、舞蹈、雕塑、建筑，各项艺术都有空前的成就。当时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中国都在全世界居于先进地位，只有大食帝国，在某些方面差可比拟。由于国力的强盛，封建统治者具有高度的自信和比较宽阔的胸襟，敢于开放门户，大量与世界各国交往，输入国外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同时也将本国的高度文化向四周各国传播。唐朝和各国往来的道路也很通畅，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可循天山南北两路，越葱岭到达中亚细亚，向南可达印度，向西可达波斯、阿拉伯。海路从南方大城市广州出发，可泛南中国海，经马来半岛，西越印度到达波斯湾；东方从登州、扬州、楚州、明州、福州、泉州等港口出发，东渡可至朝鲜、日本。遂使中国和亚洲各国（还直接间接地和欧洲东部）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唐朝的首都长安，成为当时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鉴真大师的故乡扬州，也居于很重要的地位。

扬州四周的江淮平原，以其物产的富庶言，是唐代统治阶级庞大支出和消费的重要宝库。扬州不仅是周围财富的集散地，而且远至长江上游的蜀、汉，西南的湘、桂，中南的赣、粤，东南的闽、浙等地大量输往洛阳、长安的物资，都要经过扬州，转口输出，更增加了扬州地位的重要和市场的繁